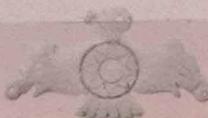


韩建业 著

先秦考古研究  
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



文物出版社

韩建业  
著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2&ZD151)  
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资助项目(PHR20100514)

先秦考古研究  
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

文物出版社

封面设计 程星涛  
责任印制 梁秋卉  
责任编辑 李媛媛 杨新改  
责任校对 李 薇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先秦考古研究：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 / 韩建业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2013. 3

ISBN 978 - 7 - 5010 - 3692 - 9

I. ①先… II. ①韩… III. ①考古学文化 - 中国 - 先秦时代 - 文集  
②文化交流 - 文化史 - 中国 - 先秦时代 - 文集  
IV. ①K871.34 - 53 ②K220.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4677 号

### 先秦考古研究：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

韩建业 著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东直门内北小街 2 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盛天行健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787 × 1092 1/16 印张: 20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0 - 3692 - 9 定价: 98.00 元

## 前　言

在北京市属高等学校人才强教计划——高层次人才计划的资助下，我从 20 年来所写的论文中选择了 38 篇，编成《先秦考古研究：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和《先秦考古研究：聚落形态、人地关系与早期中国》两本论文集。这里所谓“先秦”，特指中国新石器时代至秦皇朝建立以前的这段时期。

《先秦考古研究：文化谱系与文化交流》共包括 19 篇论文，大致分为文化谱系和文化交流两个部分。其中《朱开沟文化研究》一文是和田广金老师合作完成，《王湾三期文化研究》、《大汶口文化的立鸟陶器和瓶形陶文》二文是和杨新改合作完成。

考古学文化谱系和文化交流研究始终是考古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倾注心血最多的领域。我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新疆的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北京先秦考古》等几部专著中有集中体现。还有一些讨论古史传说而又涉及这些方面研究的论文，已经收集在《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一书当中。另外，《试论北京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和《试论北京地区夏商周时期的文化谱系》二文的主要内容已经包含在《北京先秦考古》当中，本书不再收录。

本书所收论文都发表过，其研究内容基本不与上述专著重复。另外，尽管《王湾三期文化研究》和《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二文已经收录在《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一书中，但因其在文化谱系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本书也将其收入。这些论文收入本书时仅校正了个别字词，不再做大的改动。

本书第一部分为文化谱系研究方面的 9 篇论文，是在近 20 年内陆续写

成，研究地域主要集中在中原、北方和长江中游地区。

随着近些年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遗存的不断发现，所涉及的时空范围越来越大，相互关系错综复杂。《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区系研究》一文在大的文化分期基础上，以文化内涵的异同为切入点，从宏观视角考察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区系状况及其发展演变，重点梳理了新石器时代早期晚段五大文化系统向新石器时代中期四大文化系统转变的过程，并讨论了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在早期中国文化圈起源过程中的基础性贡献。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发现山西翼城枣园 H1 遗存和陕西临潼零口一期遗存之后，对这类介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文化遗存的性质和名称有热烈的讨论。《初期仰韶文化研究》一文对这类遗存进行了综合研究，明确将其称为初期仰韶文化，置于严文明先生所划分的一期仰韶文化（即半坡类型期）之前，并划分出四个地方类型。

《试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一文是在我 1994 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主要基于我们对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的发掘，结合周围资料，第一次对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进行了全面探讨，同时提出豫南和湖北大部地区龙山前后期的巨变与“禹征三苗”事件的可能联系。《王湾三期文化研究》一文最初也是硕士论文初稿的一部分，是我为了理清豫东南龙山时代文化而对整个王湾三期文化的分期、类型和对外关系进行系统研究的结果，严文明先生因其过于“枝蔓”而建议从中剥离另行发表。该文采用严文明先生《略论仰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一文的研究方法，以对典型遗址的分析为基础，将王湾三期文化分为前后期，认为后期已经基本进入夏代。《湖北随州市西花园早期遗存分析》一文对照文化分期清楚的石家河、杨庄等遗址的情况，对西花园遗址早期遗存重新进行了分期，认为其下限已经到二里头文化三期。以上三篇都是以河南中南部和长江中游龙山时代为研究重点。

1996 年上博士以后，我的研究视野转向华北和北方地区。《晋西南豫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一文讨论的范围虽然仍在中原，但已经偏向北部。该文先对典型遗址分期，再讨论小区分期，最后将晋西南豫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分为三大阶段；在以前发表

的《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的转变，关键在于颇具东方文化特点的陶寺类型对临汾盆地庙底沟二期类型的代替，对应“唐伐西夏”事件；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的转变，主要缘于老虎山文化的南下，体现为颇具北方文化特点的陶寺晚期类型对临汾盆地陶寺类型的代替，对应“稷放丹朱”事件。

关于北京及附近地区的研究有《论雪山一期文化》一文，提出海河、西辽河、滦河流域同类遗存都应当属于雪山一期文化，早期遗存仅见于冀中地区，晚期扩展至京津唐乃至于西辽河流域，可分为午方类型和小河沿类型等。

内蒙古中南部早期青铜时代的朱开沟遗址自发掘以来备受重视，但也争议不断。发掘者田广金先生等认为其所有遗存均属于一个文化，即朱开沟文化，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其早晚期分属不同文化。《朱开沟遗址分析》对居址和墓葬分别进行分期，发现尽管存在差异，但都分为三期并互相对应，而且这三期主要器类一脉相承，因此都属于朱开沟文化。在此基础上完成的《朱开沟文化研究》一文，提出朱开沟文化实际上涵盖了整个内蒙古中南部、晋中北和陕北地区同时期遗存，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分析了朱开沟文化的聚落形态状况，另外还讨论了朱开沟文化与早期先周文化族属上的若干联系。

本书第二部分为文化交流研究方面的 10 篇论文，都是近几年所作。随着我对“早期中国”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浓厚，研究范围逐渐扩展至全国，甚至涉及早期中西交流。

自从跨湖桥文化发现以来，对其来龙去脉就众说纷纭，有人明确提出其为皂市下层文化东向迁移所致。《试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和对外影响——兼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一文则提出，跨湖桥文化是在当地文化的基础上，接受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影响发展而成；形成后反向对长江中游产生较大影响，促使彭头山文化转变为皂市下层文化。

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一向被认为早晚一脉相承，但并不排除周围文化因素的进入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双墩文化的北上与北辛文化的形成——从济宁张山“北辛文化遗存”论起》一文从对济宁张山“北辛文

化遗存”的分析入手，论证了北辛文化是双墩文化和后李文化融合形成，北辛文化中的所谓裴李岗文化因素主要间接承继自双墩文化。《龙虬庄文化的北上与大汶口文化的形成》一文认为大汶口文化形成与江淮地区龙虬庄文化的北上有关，形成后又与江淮、江浙地区文化不断交流，加上来自仰韶文化的影响，从而使得海岱和江淮、江浙地区的文化面貌越来越近似，逐渐在东部沿海地区形成“鼎豆壶杯鬻（盉）文化系统”。《大汶口文化的立鸟陶器和瓶形陶文》一文提出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发现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立鸟陶器，可能是带有茅草或羽状装饰的陶祖，是东夷人祖先崇拜的产物；山东莒县陵阳河等墓地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瓶形陶文，不过是这类神圣陶祖的抽象形式；这类陶文由鲁东南向安徽乃至于江苏等地的传播，揭示了东夷中部分人群南迁的过程。

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晚期红山文化势力强劲，但其对外影响只有玉器曾引起注意。《晚期红山文化南向影响的三个层次》一文认为晚期红山文化的对外影响存在由北渐南、由深变浅的三个层次，通过各地发现的红山式玉器和陶器，已经可以初步连起西辽河流域—河北中部—海岱地区—江淮地区这个文化传播的链条。

在不少人的心目中，屈肢葬、洞室墓等都是甘青地区的古老葬俗。《半山类型的形成与东部文化的西迁》一文则认为，与马家窑类型相比，屈肢葬和洞室墓，以及黑红复彩、锯齿纹、鸭形壶等半山类型中涌现出了诸多新的文化因素，实际上早在西辽河、冀中北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和内蒙古中南部的仰韶文化海生不浪类型这些东部文化中已经盛行，半山类型的形成大约与东部文化所代表的人群的部分西迁存在直接关联。

自安特生以来很多考古学者都将鬲视作中国文化的代表，实际上陶鬲最初发源于北方地区，有个向南扩展的过程。《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一文认为老虎山文化后期向南强烈扩张，造成临汾盆地出现文化巨变；其陶双鋯鬲、卜骨和细石器簇三种器物更流播至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对中国文明早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多数中国学者看来，某些西方人将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爵等与西方的带流器联系实在有些滑稽，但也不可就此否认二里头文化形成过程中西方文化的间接影响。《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一文论证了二里头青铜

文明是在具有兼容并蓄特征的中原文化的基础之上，接受西方文化的间接影响而兴起。二里头文化的形成是在以西进的新砦类型基础上，又融合了洛阳盆地附近部分土著因素和束颈圆腹花边罐等齐家文化因素，二里头文化中双轮车等的出现以及青铜冶金术的发展也应当归因于齐家文化的东渐带来的西方影响。其环境背景则与距今 4000 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有关。结合文献记载推测：后期王湾三期文化主体为早期夏文化遗存，新砦类型可能是少康中兴之后融合大量豫东造律台类型等因素而形成的中期夏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少康数代之后某夏王西迁洛阳盆地而发展起来的晚期夏文化遗存。

在西方文化东进的同时，中国以彩陶为代表的文化因素也渐次西进。《“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一文明确提出，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化以陕甘地区为根基自东向西拓展传播之路可称为“彩陶之路”。“彩陶之路”从公元前四千纪一直延续至前一千纪，其中又以大约公元前 3500 年、公元前 3000 年、公元前 2200 年和公元前 1300 年四波彩陶文化的西渐最为明显。具体路线虽有许多，但大致可概括为以青藏高原为界的北道和南道。“彩陶之路”是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首要通道，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对中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5000 年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一文则具体对马家窑文化南渐青藏高原并最终导致克什米尔地区布尔扎霍姆文化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揭示，提出早在 5000 年前就存在中西文化交流南道，以马家窑文化为代表的氐羌人群的南向拓展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以上就是本书的主要内容。

# 目 录

## 文化谱系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区系研究	( 3 )
初期仰韶文化研究	( 19 )
试论豫东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	( 41 )
湖北随州市西花园早期遗存分析	( 64 )
王湾三期文化研究	( 76 )
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	( 103 )
论雪山一期文化	( 137 )
朱开沟遗址分析	( 151 )
朱开沟文化研究	( 166 )

## 文化交流

### 试论跨湖桥文化的来源和对外影响

——兼论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中下游地区间的文化交流	..... ( 207 )
--------------------------	---------------

### 双墩文化的北上与北辛文化的形成

——从济宁张山“北辛文化遗存”论起	..... ( 216 )
-------------------	---------------

龙虬庄文化的北上与大汶口文化的形成	..... ( 223 )
-------------------	---------------

大汶口文化的立鸟陶器和瓶形陶文	..... ( 233 )
-----------------	---------------

### 晚期红山文化南向影响的三个层次

——从凌家滩墓地所见红山式玉器论起	..... ( 240 )
-------------------	---------------

---

半山类型的形成与东部文化的西迁	(248)
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	(258)
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	(270)
“彩陶之路”与早期中西文化交流	(286)
5000年前的早期中西文化交流南道	(301)

文  
化  
谱  
系



# 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区系研究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区系类型思想，指出要“在准确划分文化类型的基础上，在较大的区域内以其文化内涵的异同归纳为若干文化系统”，“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sup>①</sup>。这里的“区”和“系”其实是紧密联系而又有所不同的两个概念。如果单从文化内涵宏观着眼，就会划分出不同的“系”或“文化系统”，如严文明先生将中国古代文化大致归纳成三个文化系统<sup>②</sup>；而每个文化系统在特定的时间内总有其相对稳定的分布地域，就构成“区”或“文化区”，如苏秉琦先生主要依据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存的情况将中国划分为六个文化区<sup>③</sup>。其实文化系统也好，文化区也好，其数量、范围和历史地位在不同时期都可能发生变化<sup>④</sup>。本文拟在大的文化分期基础上，以文化内涵的异同为切入点，从宏观视角考察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区系状况及其发展演变<sup>⑤</sup>，兼论其在早期中国文化

①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5期。

② 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兼论赤峰地区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

③ 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5期。

④ 安志敏先生指出：“考古学文化的地理分布，常常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有所变化，除一脉相承的文化系统之外，还可能有不同的谱系和源流，即使同一文化系统的分布范围也往往会前后有所差异，并不可能长久地局限在同一‘区系’内”，见安志敏：《论环渤海的史前文化——兼评“区系”观点》，《考古》1993年7期。

⑤ 按照严文明先生的划分方案，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大约在公元前10000～前7000年，新石器时代中期大约在公元前7000～前5000年（见严文明：《中国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考察》，《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圈起源过程中的基础性贡献<sup>①</sup>。

—

中国从什么时候进入新石器时代？或者我们如何界定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呢？让我们首先从对发现最早陶器的华南及附近地区相关遗存的分析入手。

华南及附近地区发现最早期陶器的遗存，以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早期<sup>②</sup>、广西桂林甑皮岩第一期<sup>③</sup>和湖南道县玉蟾岩早期遗存<sup>④</sup>为代表。发现烧火灰堆、石器制作场和蹲踞式屈肢葬。所见陶器仅有圜底釜和圜底钵两种，多为胎质粗陋、火候较低、器表斑驳的夹砂褐陶；流行拍印绳纹，也有拍印编织纹陶、刮抹条纹陶以及素面陶。据张弛分析，陶坯制作可能采用泥条筑成法和泥片贴筑法，至少仙人洞的资料显示出条纹陶出现最早，其次是双面绳纹陶，最后是单面绳纹陶<sup>⑤</sup>。绝对年代约在距今 15000 ~ 11000 年，尚处于更新世末期。除少量陶器之外，还有不少骨、角、蚌器，更多的则是继承旧石器时代晚期而来的各类打制

- 
- ① “早期中国文化圈”，是指商代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以中原为核心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韩建业：《论早期中国文化周期性的“分”“合”现象》，《史林》2005 年增刊），与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第 6 页，文物出版社，1989 年）、严文明先生提出的“重瓣花朵式的格局”（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 年 3 期）、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共识的中国”（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 161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等概念内涵接近。
- ②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试掘》，《考古学报》1963 年 1 期；江西省博物馆：《江西万年大源仙人洞洞穴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1976 年 12 期；张弛：《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 年。
-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桂林甑皮岩》，文物出版社，2003 年。
- ④ 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 1 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 年。
- ⑤ 张弛：《中国南方的早期陶器》，《古代文明》（第 5 卷），文物出版社，2006 年。

砾石石器，不过石锤、石钻、砾石，尤其是穿孔重石的发现，则显示出由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过渡的趋势。此外，该时期玉蟾岩的稻谷遗存和仙人洞的水稻植硅石，表明当时可能已经出现原初的稻作农业，甑皮岩则当已出现原初的家猪驯养业。

南岭两侧的这些早期遗存陶器和农业或家畜饲养业大体同时出现，并已经开始由打制石器向磨制石器过渡，尽管当时尚未进入全新世，也应当已经是中国、东亚乃至世界上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存了。这类遗存总体面貌近似，可以归纳为“绳纹圜底釜—圜底钵文化系统”。只是南岭南北两侧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比如南岭以北的玉蟾岩和仙人洞遗址的陶釜大口斜直腹，出现稻作农业；而以南的甑皮岩遗址仅见陶钵，虽已养猪，却未有稻作农业迹象。甚至玉蟾岩和仙人洞本身的陶釜形态也有区别。只是由于资料太少，我们还很难弄清它们间的细部差异，也就暂时不好划分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过即使“甑皮岩文化”的名称能够成立，大概也只能涵盖该系统南岭以南的范围。

## 二

稍后的大约距今 11000 ~ 9000 年，华南地区文化以甑皮岩第二期和邕宁顶蛳山第一期遗存为代表<sup>①</sup>，陶器主要为小口高颈绳纹釜，常见附加堆纹压印形成的花边口沿，当为绳纹圜底釜—圜底钵文化系统的继续发展。更为引人注意的是在长江下游、中原腹地、黄河下游和华北等地区也开始出现包含陶器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阶段文化遗存。

长江下游地区以浦江上山第一阶段遗存<sup>②</sup>和嵊州小黄山早期遗存<sup>③</sup>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杭州湾南岸地区。发现底部放置石磨盘、石磨棒或完

<sup>①</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西工作队等：《广西邕宁县顶蛳山遗址的发掘》，《考古》1998 年 11 期。

<sup>②</sup>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浦江博物馆：《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7 年 9 期；蒋乐平：《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与思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06 年。

<sup>③</sup> 张恒、王海明、杨卫：《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5 年 9 月 30 日第 1 版。

整陶器的灰坑，可能具有储藏或食物加工功能，成排柱洞可能是干栏式建筑的遗留。陶器多为平底器，圈足器次之，流行敞口平底盆、双耳罐、敞口豆、平底盘、平底钵，还有圈足盘、矮圈足罐、高颈壶、直腹杯、圜底釜等。常见双环耳、双贯耳或双銎，有的双耳紧贴颈部，颇具特色；以夹炭陶为主，质地疏松，偏晚夹砂陶增加。厚胎多呈淡黄色，器表一般素面红衣，个别沿外饰刻划折线纹、戳点纹；有的圈足饰圆形镂孔或竖条状镂孔；以泥条筑成法和泥片贴筑法制作。石器主要为打制的石片和砾石石器，有少量石磨盘、石磨棒、穿孔重石、石球，以及极少量通体磨光的锛、凿等。这类遗存器类丰富，器物附件和装饰复杂，发展水平较高，可以称之为“平底盆—圈足盘—双耳罐文化系统”。由于内涵较为清楚，已被命名为上山文化。据对陶胎中所夹杂稻壳的分析，可知该文化可能存在原始粳稻的栽培<sup>①</sup>。

中原腹地以河南新密李家沟“细石器文化遗存”和“早期新石器遗存”为代表<sup>②</sup>。发现包含石磨盘、石砧、烧石、动物骨骼碎片等的石块堆，可能是加工动物骨殖的遗留，或兼具烧烤功能。陶器主要是直口的深腹罐类，均为色泽斑杂的夹粗砂褐陶，外表多饰压印或拍印圆窝纹和绳纹，也有少量篦点纹和刻划纹。部分陶片的质地较坚硬，显示其烧成火候较高。共存较多细石器、个体较大的砂岩制品以及扁平石块、局部磨制石锛、石磨盘、石砧等。暂时可称“深腹罐文化系统”。

黄河下游地区以山东沂源扁扁洞早期遗存为代表<sup>③</sup>。发现烧土面、灰坑等遗迹。陶器仅见圜底釜和钵的残片，为器表斑杂、火候不均的厚胎夹砂褐陶。主要以泥条筑成法制作，有的表面略经压光处理，有的沿下贴加一周泥条。共存石磨盘、石磨棒，以及锥、针、镖等骨角器。暂时可称“素面圜底釜文化系统”。

① 郑云飞、蒋乐平：《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考古》2007年9期。

②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4期。

③ 孙波：《扁扁洞初识》，《文物研究》（第16辑），黄山书社，2009年。

华北地区以河北徐水南庄头<sup>①</sup>和北京门头沟东胡林<sup>②</sup>、怀柔转年<sup>③</sup>早期遗存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太行山和燕山山麓。在东胡林遗址发现火塘和墓葬，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葬式多仰身直肢，个别仰身屈肢，墓主人随身佩戴螺壳、兽骨组成的项饰、骨镯等。陶器主要是直腹平底盆或筒形罐。以夹粗砂者占多数，质地疏松，器表呈斑杂不均的褐色。除个别口沿外有附加堆纹、压印纹和鑿状装饰外，其余基本为素面。石器主要为打制石器和细石器，也有石磨盘、石磨棒、石臼、石研磨器等磨蚀石器，还有极少量斧、锛等磨制石器，以及锥、鱼镖、骨梗石刃刀等骨角器和复合器。这类遗存总体上可以归纳为“直腹平底盆—筒形罐文化系统”。这个系统也有地方性差别，如偏南的南庄头遗存中陶器多拍印绳纹，而偏北的东胡林类遗存中陶器刻划几何纹，待资料充分后或许可据此划分成两个考古学文化（图一）。

由于资料限制，现在还很难深入讨论上述五大文化系统间的相互关系。大致来看，彼此空间距离较远，差异较大，似乎不存在直接的联系，但也不是没有共性，尤其是相邻文化系统之间。这些共性分两种情况。其一，可能是相似的经济方式或共同的发展阶段所导致。比如陶器粗陋、夹粗砂、褐色等特征当是制陶技术处于初始阶段的反映，石磨盘、石磨棒在华南以外其他系统的普遍出现则可能与自然环境变化引起的人们对禾本科植物种子的加工利用有关。其二，可能是彼此间存在一定联系的反映。比如长江下游小黄山遗址的少量双耳带领罐、绳纹圜底釜等，就有可能是受到华南绳纹圜底釜—圜底钵文化系统的影响；黄河中游李家沟遗址的深腹罐上拍印圆窝纹和绳纹，可能也和华南有一定关系，绳纹陶还见于华北的南庄头遗址；黄河下游的扁扁洞遗址虽未发现绳纹，但却流行陶釜，也不排除和

- 
- ①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郭瑞海、李珺：《从南庄头遗址看华北地区农业和陶器的起源》，《稻作 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 ② 周国兴、尤玉柱：《北京东胡林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72年6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考古》2006年7期。
  - ③ 郁金城、李超荣等：《北京转年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的发现》，《北京文博》1998年3期；李超容：《北京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的新发现》，《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世纪回顾·旧石器时代考古卷》，科学出版社，2004年。